

第一章 现代社会学的冲突与困境

现代社会学在 19 世纪上半叶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形成，各种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学奠基者们的深入思考。尽管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人都留下了许多令后人赞叹的经典著作，他们博大精深的思想为现代社会思想史增添了辉煌，然而，就是在这些为社会学理论大厦奠基的著述中，包含着社会学理论的尖锐矛盾。这些理论矛盾引发着不断的思想冲突，使社会学陷入了只有开展自身革命才能摆脱的困境。

一、实证社会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社会学从反对形而上学传统出发，立志建立一门客观地、正确地认识社会现象的科学，当孔德把社会学的实证原则称为人类历史上三种思维方式中最高阶段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一场具有意义的革命。孔德兴奋地宣称：“现代社会性使工业生活越来越占优势，因而它应有力地支持伟大的精神革命。今天，这种精神革命已将我们的才智最终从神学制度提高到了实证制度阶段。这种每日每时实际改善人类条件的积极趋势，在一神论条件下不仅总是与宗教定见（它总是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目的有关）格格不入，而且这种活动必然最终激起人们彻底地

自发地普遍反对神学哲学。^①

迪尔凯姆也像孔德一样，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克服了哲学偏见的科学，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成熟的独立的学科，必须明确无误地同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划清界限，否则就无法完成社会学面向社会事实，达到对社会现象客观的、准确的科学研究。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无须使用那些使形而上学者们发生意见分歧的重要假说。它既没有必要肯定自由，又没有必要肯定决定论。”^②在迪尔凯姆看来，不使用形而上学命题的理由在于它是包含超现实的理想或具有政治要求的价值判断，是用玄秘语言来说明社会的抽象逻辑，它不仅无助于人们认识客观的社会事实，而且会使人们远离实际存在的社会。

其实，无论孔德和迪尔凯姆用何种判断来说明社会学同形而上学的对立，也无论他们用何种修辞来显示社会学的革命意义，说到底不过是把物理学的客观性原则移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把社会现象看做外在于研究者的客观对象，用确定的方法追究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定性，这是社会学初创时期据以区别形而上学以及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主要根据，也是社会学创始人对社会学规定的本质特征。迪尔凯姆说：“关于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是我的方法的基础……实际上，我不是说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③可见，迪尔凯姆时时注意同哲学的对立，当他把社会事实归结为物时，他担心别人把他同唯物主义归到一起，申明自己所说的物不是物质之物，而是把社会事实当作物质一样

① 孔德：《实证精神讲话》，引自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 87 页，华夏出版社，2000。

②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 152 页，商务印书馆，1995。

③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 7 页，商务印书馆，1995。

的外在性来看待。

被迪尔凯姆当作外物来看待的社会事实，往往是指教育、风俗、集体意识等文化现象，而不是仅指被其他思想家也承认有客观性的经济生活或物质关系。这就更明确地说明，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看待，不是一个本质判断，而是一个方法论命题，是表明必须把一切社会现象都作为研究者的外在之物去研究的客观关系、客观类型或客观规定性。迪尔凯姆和孔德、斯宾塞等其他实证主义者一样，不是否认社会生活中有精神的或思想意识的主观因素，而是主张要把这些进入社会学视野的主观因素当作客观因素来看待。因此，实证主义者实质上是在强调自己建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被实证主义自诩为精神革命的实证思维方式并不新，它不过是由柏拉图创始，中经基督教神学绝对化，由笛卡尔明确的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 19 世纪的翻版。柏拉图把世界区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认为这两个世界都是外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基督教神学把世界划分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世俗之城的实质是教民的个人心理世界，上帝之城则是外在于人们心理的客观本体世界；笛卡尔认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并行不悖的，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通过松果腺的作用，实现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达成二者的统一。其实，无论这些论述多么精彩、严密、复杂，只不过在强调一个原则：客观世界是自在的，主观世界是自明的，主观世界可以认识客观世界。而这个原则展开的基本关系：主观同客观的对立，以这个对立为前提追求二者的统一，这就是在欧洲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哲学思维方式，也是科学的和生产的思维方式。

孔德要比迪尔凯姆坦率得多，他认为社会学就是用物理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物理学发现自然规律，社会学发现社会规律，其实质都是主观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模仿物理学的方法，不仅

是对实证科学的搬运，而且也是对哲学的继承。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等近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都包含着强烈的科学精神，都体现着科学的思维原则。因此，模仿物理学的方法，实质上是对实证科学和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同时继承。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迪尔凯姆以坚持实证科学方法自居时，他的思想观点被评价为是唯物主义的。

迪尔凯姆嘲讽那些把他当作唯物主义者看待的人，他认为自己所说的物不是物质之物，而是一种在思想之外的客观性。其实，迪尔凯姆这个申辩，仅仅能表明在本体论上，亦即在世界的本质和本原上他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不仅未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还常常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寻找事物发生的原因。在本体论上不是唯物主义者，不等于在方法论上也同唯物主义无关。无论是素朴唯物主义还是机械唯物主义，他们都一方面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另一方面他们还都认为世界是外在的，是作为客观领域能够被人们反映的。也就是说，唯物主义既承认世界的物质本质，也肯定世界的客观外在性。在后一方面，迪尔凯姆显然同唯物主义没有根本区别。

这里我们不是非要把迪尔凯姆划到唯物主义阵营，而是要指出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仍然是在哲学限定的主观与客观二元分立思维方式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进一步说，迪尔凯姆不断强调的社会学思维方式，不仅同唯物主义有共同之处，而且同某些唯心主义也有共同点。柏拉图、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也都把世界看成是外在于人的主观意识的。

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是哲学家们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当人类刚刚从自然界中站立起来的时候，自然界在人类面前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强大无比、神秘可畏的。即使人类有了可以向自然宣战的能力，自然界自身的运行规律及其各种运行机制，也并非人类可以

顺利地把握到的。几千年的文明史，确如马克思所言，最基本的是一部人类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的历史。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就是植根于人类刚刚成为人就开始的认识自然和开发自然的实践活动之中。主观同客观的对立，说到底是人自然的对立。主观同客观二元分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建构出来或概括出来的。

如果这些分析是成立的，那么紧接着社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植根于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否可以用来思考社会问题，是否可以像孔德、迪尔凯姆那样，严格地把社会学的方法规定为单纯追究客观性的物理学方法。简言之，研究自然之物的方式能否研究社会之人？这是李凯尔特、狄尔泰、尼采、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一再提出，并且做出否定性结论的问题。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学的实证思维方式后，随即遭遇这样的质疑。他为了论证自己的有效性，不得不抽离掉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特征，而强调它同物理现象的共性。借用人本主义的批评来说，这是在把人性物化、主观性客观化、社会生活自然化。

孔德、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不仅仅通过社会学表现出来，19世纪初以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甚至史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都掀起了实证主义的风潮，在社会生活中发现客观规律，寻找客观真理，创造普遍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愈演愈烈的倾向之一。尽管这种倾向受到了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激烈抨击，但是，有当时物理学迅速发展并给生产技术带来巨大促进的诱惑，模仿物理学等实证科学的热望难以抑止。并且，实证主义或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受到孔德和迪尔凯姆等法国学者热烈推崇，与他们所处的法国的历史背景有关。法国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中心，摇撼欧洲社会结构的动力源于法国，而当法国确立资产阶级政治

结构之后，它又先于其他欧洲各国要求社会迅速稳定下来，以便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实现资产阶级完成工业化的理想。把社会看做一个外在现象，发现它的客观规定性，提出控制自然一样的控制社会的方案，既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也是它的社会要求。孔德和迪尔凯姆的实证思维方式不过是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要求的理论概括，正像恩格斯说黑格尔辩证思维方式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矛盾心理的理论表达一样。

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建立社会学，是社会学奠基者在 19 世纪时代背景下，在几千年传统的欧洲哲学思维方式中做出的形式上有变化，实质上无新意的选择。同德国古典哲学相比，实证社会学发生的变化不过在于：明确提出从经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原则，所有结论的根据不是逻辑推论而是经验事实，理论的结果是不脱离社会事实的有条件限制的命题，而不是普遍有效、不受时空限制的玄思。说这些变化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是针对社会学奠基者自以为社会学思维方式引起了精神革命而言的，也就是说，实证社会学同传统哲学的不同之处谈不上是精神革命，更不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它仅仅是在传统思维方式的限制中开展的经验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追求。

否定实证社会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并不意味着断定它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孔德和迪尔凯姆把社会学思维方式等同于物理学思维方式，有其科学的、政治的和时代背景的意义一样，它在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中也能找到根据。社会事实确有其外在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一面，诸如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杀率、迁移率等等社会事实，确实可以进行客观性的、外在性的定量研究。因此，完全否定物理学方法或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的适用性也是不可取的。问题在于不能把实证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绝对化，认为它是可以取代其他任何思维方式的精神革命。实证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研究社会

现象时有其一定程度的适用性，但是使用这种思维方式看社会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对社会现象展开的完整的研究，而是从社会的某一个侧面开展的研究，并且这种客观化的研究是以把人的社会当作物的社会去研究的。但是这仅仅是“当作”而已，人的社会终究是有人性的，必须把社会中的人当作人去对待，也必须把人形成的社会放在人性这个根本观点上做出最终的论断。

实证的二元论社会学思维方式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或一种环节，而不应是社会学研究方式或思维方式的全部。正像韦伯提出研究社会中的人的活动首先必须用理解的方式去理解人，实现同被研究者的意义沟通，然后才能开展有效研究一样，研究人的社会也可以先把它对象化，“当作”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客观现象，去观察它，测量它，描绘出一个具有外在规定性的社会模式。实证主义者以为至此就可得出关于所研究的社会问题的科学结论，其实，这仅仅是开始。如果要追求真正“科学的”话，还应继续前行，起码应当把韦伯主张的作为接触被研究对象手段的那些理解方法吸收进来，否则看到的只能是人及其社会行为的表面现象。

二、解释社会学对实证社会学的批判

韦伯不赞成迪尔凯姆把社会现象当作外在之物来看待，认为社会现象同物理现象不同，它不能用物理学的原则简单地追究其客观性。社会现象的实质是社会行动的表现，而社会行动的本质属性是行动者们在意向性上的关联性。因此，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与物理现象或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的客观性，而在于它的主观意向性，所以研究社会问题必须把主观性作为根本问题去对待，必须承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有意向性的人的社

会行动。一般说来，这表明韦伯同迪尔凯姆等客观主义的实证论是截然对立的，因为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韦伯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所以，人们都认为韦伯代表了西方社会学史上同实证主义对立的另一个传统——人本主义社会学。这种结论是很容易得出的，因为韦伯关于行动的意向性、行动的理性根据、权威类型、社会分层、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论述，都是把关于人的主观意识的解释放在一个根本的地位上。

韦伯同孔德和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的对立，是人本主义传统同科学主义传统对立在社会学领域里的表现。人本主义传统同科学主义传统的对立源远流长，如果说孔德和迪尔凯姆的实证论同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洛克的经验论有联系的话，那么同实证论对立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反对二元论和经验论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历史主义思潮，而这两种思潮的共同源头可以看做是意大利思想家维柯 (G. Vico, 1668~1744) 提出的新科学思想。

维柯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然科学刚刚兴起，以其勃勃生机不断取得快速进展的时代，伽里略等人概括出的科学原则被笛卡尔和洛克等人提升为普遍性的科学理性，不仅被实证科学和经验论哲学推崇至极，而且对经济学、政治学和史学等学科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理性是二元论、经验论和实证论的思想核心或理论基石。科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是：外部世界是客观自存的，人们可以通过经验的观察和逻辑的思考，掌握客观世界的普遍本质与永恒规律，形成可以转化为控制和征服自然与社会的力量。把科学理性作为普遍原则的科学主义，成为在各种文化形式中都被举起的旗帜，科学理性原则成为控制人们思想与生活的基本原则。维柯认为这是欧洲人走向精神误区的普遍表现，他向人们疾呼，不要片面地相信实验科学的原则，人无法获得关于自然的确切知识，真正可信的知识是人通过研究语言、神话、艺术和文学

而达到的对自己的理解。维柯不仅坚决反对用科学理性的原则来理解人生和社会，而且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从根本上就是靠不住的。维柯主张用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在历史过程中理解人生、追求生活的意义，尽早地从科学的迷幻中逃脱出来。

维柯的思想首先受到浪漫主义的响应。德国狂飙运动先驱赫尔德（J.G.Herder, 1744~1803）反对法国启蒙主义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主张哲学应当从整体上关心人、爱护人，寻求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只有从历史主义的美学观点看待人及其生活，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生的意义。歌德（J.W.Goethe, 1749~1832）和席勒（F.Shiller, 1759~1805）作为狂飙运动的主将，更坚决地反对科学理性专断，反对科学主义思潮泛滥。他们宣布：科学思维方式只能机械地认识自然对象，而不能理解有目的、有创造性的人生；只有用具象性的、整体性的美学思维方式才能在整体中真实地理解人生及其意义，才能弥合被主客二元论撕裂开的鸿沟，才能把人生引向对自我的最高价值的追求中，才能培养完整人格，实现人生美满与社会和谐。

维柯的新科学主张在德国历史主义思潮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历史学家德罗伊生（J.G.Droysen, 1808~1884）强调历史研究是对具有价值理想和意义追求的人生过程的研究，应当高度重视社会历史中的主观性因素，并有效地开展具有主观性的历史理解，而不是像实证主义史学家兰克（L.Ranke, 1795~1886）那样采用“剪刀加浆糊”的史学研究方法。他认为，兰克的追求历史客观性、“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方法，是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不仅无法理解历史，相反却能湮没历史、误导人生。

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狄尔泰（W.C.L.Dilthey, 1833~1911）把德罗伊生开启的历史理解论提升为一般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是具有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的过程，与按照自在必然性运行的自然过程有本质的区别，以自然科学原则

为根本基础的科学认识论无法理解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必须建立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认识论和实证方法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基本方法是理解，理解的基本形式是体验（*experience*）和移情（*empathy*），它通过内部而达至人的心理深处，而不是像经验主义认识论那样主张外部观察。理解被认为是人的生命存在，人只要存在就一定在理解，因此概括理解的形式与过程，就可以建立符合人类生活过程、真实理解生命现象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或曰人文理解论。

韦伯就是继承了从维柯到狄尔泰这样一个反对二元论和客观经验论的传统，特别是直接继承了德罗伊生和狄尔泰的历史解释学或人文理解论，建立了直接反对孔德和迪尔凯姆实证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学。韦伯同实证社会学的对立，是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长期存在的人文主义同科学主义的对立在社会学内部的表现，这种对立对于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明晰社会学理论欠缺，促进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深化，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韦伯同迪尔凯姆等人的对立是不彻底的，在对社会现象最终形成何种判断或何种知识的问题上，韦伯甚至同迪尔凯姆等人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韦伯看来，由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在特定的主观意愿支持下开展的，而人们的主观意愿又是在特定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结构、理想选择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人们的社会行动，就必须首先理解人的主观意愿，理解人们主观意愿存在于其中或限制、规定着主观意愿的那些文化因素，并且特别要理解主观意愿及相关文化因素中的价值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具有不同价值的主观意愿及其支配下的社会行动的理解。这就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相关性”观点。

韦伯肯定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相关性”，目的在于实现更可靠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无涉性”亦即“价值中立性”。承认

社会行动的主观意向性，并肯定“价值相关性”研究的意义，既是因为韦伯关于主观意识在社会学研究对象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判断与迪尔凯姆不同，又是因为韦伯意识到：只有通过有别于物理学认识方法的理解方法，才能达成同被研究对象——在社会中行动着的人的沟通；只有知道人们的意愿、目的和选择，才能了解到被人们的某些行为掩饰着的心理活动。韦伯对此做出了大量的论述，使人们看到他同实证主义者的对立是多么鲜明。但是，这些仅仅是初步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是入手处或切入口，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和最终的目的上，韦伯就难以同迪尔凯姆等人区分开了。因为韦伯主张，在一定价值判断的引导下选择了研究对象，用“投入”、“体验”、“同情”和“沟通”等方法对被研究对象的主观意愿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后，就要上升到客观的和因果性的解释，而这时研究者必须排除自己价值观念的影响，避免使用表达自己感情色彩和理想选择的价值判断，即保持价值中立。

韦伯反对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的不彻底性，深刻地表现了社会学初创时期面临矛盾的复杂性。韦伯认识到把由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社会现象当作物来看待完不成社会学的承诺，因此必须用把人当做人的理解方法来接近人、理解人，然后才能开展更深刻的社会学研究。但是，关于社会学的承诺，或者说把社会学建成什么样的学科，社会学能为人类肩负何种使命，韦伯同迪尔凯姆等人没有实质的区别，即他们都要把社会学建成科学，建成能认识社会规律，管理和控制社会活动的科学。无论是社会物理学，还是关于人的社会科学，只要是科学就必须能为人类提供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知识，这是至今一直被追求科学的人们坚持的一个准则。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同“价值中立性”两个原则的矛盾，既可看做他同实证主义的对立与统一在自己思想理论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做社会学初创时期面临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承诺或学科定位矛盾的折射。

韦伯反对实证主义的不彻底性，是维柯以来欧洲人文主义反对科学主义的共性，除了歌德和席勒等浪漫主义者是从文学和美学的立场上比较彻底反对科学主义客观论以外，维柯、德罗伊生和狄尔泰等人在批判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时，都表现了明显的不彻底性。维柯在指责自然科学方法不能形成正确的真理认识时，却主张通过对语言、神话和文学、艺术的思考而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科学，新科学能为人类提供的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真理，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必然规律的认识。因此，尽管维柯举起了反对科学主义的旗帜，并自觉地质疑了实证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抛弃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原则，而是把这个原则移到了社会历史的研究上。

德罗伊生和狄尔泰的历史理解论和人文理解论，虽然比维柯的思想深化得多、丰富得多，但是他们同样存在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不彻底的问题。德罗伊生和狄尔泰都尖锐地揭示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失误，然而他们都是在指责对方之后，又接过了对方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历史普遍规律”或“真正历史客观性”的历史科学和人文科学，一句话，他们并没有跳出科学的篱笆，而是站在科学范畴之内，用确定科学的根本原则来反对科学的表现形式。确立科学的根本原则就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不过是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展开形式。由于维柯、德罗伊生、狄尔泰等人没有彻底批判长期统治欧洲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客二元论思维方式，没有从这个深层根据来批判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理论局限，所以，尽管他们提出了超越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某些主张，也指出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许多失误，但是当它们建构自己的理论时，没有找到新的立足点，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又把他们重新拉回到科学的窠臼之中。

对于韦伯来说，科学情结更是根深蒂固。当人们说韦伯作为人本主义社会学的代表反对实证社会学传统时，很容易认为韦伯像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本主义者那样反对科学专断、弘扬人性。其实，在韦伯思想中存在的人本主义精神是十分有限的，就其学术思想的总体趋向而言，他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客观主义原则是他从事学术研究长期坚持的一个准则。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反复申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把尊重事实、追求客观性知识作为立身之本，而不应把那些个人好恶、理想选择等价值要求掺入科学的事业之中，不仅科学研究者应当如此，而且传播科学的教师或以学术为业的学者，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信守这条原则。他说：“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①这段话仿佛在复述孔德和迪尔凯姆等人的实证主义原则。李凯尔特评论韦伯的科学观或学术观时指出：“他很正确地只限于让自己宣布，专业研究者必须使自己同一切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尤其是所有政治的价值判断保持距离。对于披着学术外衣做出的‘预言’，特别是教授在讲台上做这种预言，韦伯是深恶痛绝的。”^②

马尔库塞曾指责韦伯站在实证主义立场上鼓吹工具理性，认为韦伯不是一个人本主义者，而是一个用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来压抑价值理性的实证主义者。从韦伯的科学立场和客观知识追求上看，他确有实证主义之嫌。但是，把韦伯同实证主义等同起来

^① 韦伯：《学术与政治》第 45 页，三联书店，1998

^② 李凯尔特：《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引自：《学术与政治》，第 135 页，三联书店，1998。

又过于简单。应当说，韦伯是从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起点出发，走上了追求社会学客观的科学知识的道路。这种起点和过程的矛盾，既是韦伯社会学研究切入点和理论展开形式的矛盾，也是社会学无论在哪个流派那里都存在的学科承诺和学科定位的矛盾。

三、现代社会学的困惑

韦伯晚年曾陷入关于科层制的困惑之中。作为社会管理模式理论，科层制是韦伯对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肯定，特别是对按照工具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的概括。韦伯不仅对科层制管理模式十分欣赏，认为它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之一，只有坚持科层制管理方式，企业与社会组织才能高效而规范地运行，而且还对自己概括的科层制理论也很满意，认为它客观地概括出工业化过程出现的高效的管理模式，可以指导现代社会进一步理性化。然而，晚年的韦伯深深地感到，虽然科层制能够规范、严格、高效地管理企业与社会，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实施的结果，不仅促进了社会理性化进程，而且也使现代人陷入了被严厉制约、丧失自由的境地。他认识到科层制对欲实现现代化的所有民族来说，都是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只有按照科层制来管理社会才能高效化、理性化，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达到，社会的落后与贫穷状态才能改变；然而一旦要是执行了科层制管理，社会生活获得了高效性和规范性，现代人就受到了严格的、非人化的控制，高效性和规范性的意义也就随之湮没。因此，韦伯把科层制看做现代人不得不进去的“铁囚笼”。

韦伯关于科层制的困惑，不仅在于科层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必要性及其负面效应的矛盾，而且还在于他的社会学理论承诺同科层制的负面效应、亦即他的社会学理论负面作用的矛盾。

韦伯以人的社会行动和行动的主观意向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其中表达了韦伯关心人，从真实活动着的人出发的基本愿望。韦伯在关于行动类型、权威类型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研究中，一贯注意研究人的意愿、目的和理性根据，尽管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形成客观性科学知识，但是也明确地表现了从人出发、理解人、推进现代人的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承诺。然而，在这种理论承诺支配下开展的社会理性化研究，特别是他概括出来的科层制理论，却起到了压制人的活动、扭曲人的本性的作用。晚年的韦伯发现，科层制理论不仅是对西方官僚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且起到了引导西方官僚制度向更加分级化、非人化的方向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与韦伯从人出发、以理解人的主观意向为切入点的社会学研究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孔德也遇到了类似韦伯的困惑。孔德是一个严格的客观实证主义者，他以很多笔墨批评形而上学从价值理想出发、用玄秘语言来解释世界，认为这是中世纪神学化在近现代社会的翻版，是用抽象逻辑代替了神学崇拜，实质也是远离社会，把人类引向不实的虚空的理论神话。因此，孔德一再呼吁要用排斥情感、排斥价值判断的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只问是什么，不问应当是什么”，这是孔德实证原则的最简明表达。然而，晚年的孔德却深深沉入“人道教”的表象之中，他不仅淡化了实证原则的客观性，而且把情感体验、价值理想等主观因素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热烈地歌颂宗教情感和道德伦理。人们都说晚年的孔德坚决而彻底地反对了中青年孔德。为什么孔德自己反对自己，为什么动摇了自认为精神革命的实证主义信念，为什么从排斥主观情感的实证原则转向了以主观情感为基础的宗教立场。人们对此感到困惑，孔德自己也常常因为这种变化而困惑。

韦伯的困惑是对自己理论的作用的困惑，孔德是对自己理论原则变化的困惑。虽然这两种困惑在内容上不同，但是，这两种

困惑都是自己怀疑自己，自己反对自己，并且更深入地看，引起这两种理论困惑的原因也是相同的，即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理论承诺是指一个学科或一种学说的理论目标或理论追求，它表现为理论给自己规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程度、为社会或人生创造的价值与意义等。这种理论承诺不论是明显自觉的还是隐含自在的，对于任何门类的学科来说都是存在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以特有的理论承诺为产生或存在的前提，否则，一个学科就提不出自己的理论任务，也明确不了自己的学科地位。理论原则是指一个学科或一种学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承诺而选定的方法原则、运思规则、表述方式和操作程序等等。可见，理论原则是为实现理论承诺而选定的方法或手段，二者应当是协调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对于初创时期的新兴学科尤为重要。

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们在社会学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上遇到了无法排除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孔德那里表现的最突出、最明显。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始人，孔德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布：社会学是一门立足经验事实的、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科学。孔德的宣称包含着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其一，社会学是经验学科，它不能脱离经验事实而抽象地逻辑推论，以此而有别于形而上学；其二，社会学要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对社会开展综合性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进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并且社会学要揭示出社会各种构成因素的结构联系和变迁趋向，以此区别专注社会个别层面或个别关系的其他社会科学；其三，社会学要像实验科学那样研究社会，即用客观性的观察、实验、思考的方法揭示社会生活的必然规律。

从经验事实出发，对社会开展整体性研究，这个理论承诺同用客观的方法把社会学建成科学的理论原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使不明确提出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生活，仅从经验事实出发这一点主张就决定了社会学一定要把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纳入自

己的理论视野。因为只有理论是片面的，而经验事实都是完整的。在现实的经验过程中，不仅难以看到纯粹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现象，而且也无法找出传统哲学和实证科学所说的，处于分离状态的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识。经验就是整体，经验就是综合，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从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决定了社会学不可能仅在社会生活的哪一个特殊方面或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哪一个方面做出确定的选择。然而，孔德根据其建立客观的科学知识的理论原则，还是自相矛盾地选择了（应当说“切割出”）经验中的客观方面。

至于从整体上研究社会这个理论承诺同社会学理论原则的矛盾就更加显而易见。当人们把一个事物当作整体来看待时，就要求人们不仅要从全貌、全局、全部因素上来把握这个事物，而且还要从这个事物的历史过程中来把握它。一个完整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事物一定是具体的、有其历史展开形式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一个社区或一个民族，如果不是仅仅分析其中的某个事件或某个方面，人们看到的二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存在的形式，一定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可变化的过程。具体的具有历史形式和历史过程的整体，不可能是孤立的、片面的、分析式的，更不可能是仅有客观性而无主观性的。因此，除非放弃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要么就不可能把社会学仅仅建成追求客观性的科学。

经验性、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同客观性分析、亦即同主客二元论的思维原则的矛盾，这种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也有所表现，甚至更尖锐、更复杂。斯宾塞也明确强调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性和整体性，并且同时把客观性原则推向了极端。斯宾塞认为，他和孔德一样都从整体上来研究社会生活，都反对脱离经验事实的哲学推论，但是，孔德是不彻底的，因为孔德并没有真正坚持经验研究的客观性，而是仅仅